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新旗

期二十第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我們對憲法的認識

振聲

國民黨一黨的『國民大會』終於召開了。我們對牠的態度已經一再表示得清清楚楚，我們堅決反對這一套強姦民意的把戲，現在不想多說了，我們現在要講的是關於另一方面，關於憲法方面。

國民黨召集牠的『國大』，據說主要是爲了制憲，就是要通過一部憲法；某些自稱第三方面的人，原先決定不參加，後來又參加了『國大』的，他們所持的理由，主要也是爲了制憲。他們說，如果能够產生一部好的憲法，那末即使參加了不好的『國大』也是值得的。

一切都爲了憲法。

但究竟憲法是什麼東西呢？牠可是一種萬應靈丹，能够醫治百病，能够叫這病人膏肓的中國政局起死回生呢？國民黨、青年黨、民主黨、甚至民主同盟，更甚至共產黨，都給了我們這樣的印象，彷彿有了一部完美的憲法，中國的一切都有救了。

所以他們都覺得，而且要使我們小百姓大家也覺得，一切問題在於如何寫成一部好的憲法。

其實，這又是一個大謬騙。

什麼叫做憲法？普通，人們總是這樣說的，牠是一個根本大法，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必須共守的一種規約，所以牠是法治與民主的基礎。因此，人們總是說，一個完美的憲法之有無，乃是一個國家之爲民主或獨裁的不二標誌。其實，這也是不對的；至少是不盡然的。

舉一個明顯的例子：魏馬憲法可算是自有成文憲法以來寫得最好的一部民主憲法了，希特勒制度却是有史以來最最野蠻的一個統治制度，但是你們應該知道，這兩件東西曾經在德國同時存在了的一再

如：史大林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公佈過一部不僅民主的，甚至是『社會主義的』憲法，但在公佈同年，最無人道的莫斯科冤獄就發生了。他在最民主的憲法掩護之下殺死了整代的老布爾雪維克。

這就說明了沒有羣衆實際力量支持的憲法，即使寫得十分美滿漂亮，也是可能替醜惡的力量服務的。

四五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尤其充滿了這類諷刺憲法的實例。清朝的且不說牠，入民國後的什麼袁世凱的『民國約法』，『曹錫憲法』，入國民黨統治後的什麼『民國約法』，以及所謂『五五憲草』，那一個文件不是騙人的具文，於國計民生沒有絲毫益處的？

我們並不反對中國有一部好的憲法；但我們不願自欺，也不願騙人，我們不相信光是一部漂亮的憲法可以解決問題的。因爲所謂憲法究竟是什麼呢？

第十一期目錄

我們對憲法的認識

振聲

工人自編生活指數..... 舒嚴
歐洲革命問題（下）..... Ernest German
論反官僚運動..... 唐盛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下）..... 劉默
讀者通信

國民大會質疑..... 高登 張瑞連
工廠通信

小廠家工人的痛苦..... 阿根
發行者 新香港西灣社
通訊處 太古船塢李振聲

? 極乃是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在某一時期所存在的各種勢力的真實關係之法律表現吧了。如果真實的勢力關係不改變，亦即階級關係不改變，那末縱使能够寫出一部好看的憲法，也決計不會遵守與實行的。何況目前中國情形看，如此這般的『國民大會』，根本連形式上好看憲法都產生不出來。

因此，我們固然要反對國民黨的『國大』製造什麼憲法，固然要反對其所製造的憲法，但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明白，如果真正依照了政協程序，真正草成了一部比較好的憲法，但祇叫真實的階級關係還是如此，這樣的憲法仍是無用的。所以重要的是我們工農大眾能够自己起來，組織起來，召開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然後不但能製訂好的憲法，而且能保證這個好的憲法的實行。

工人自編生活指數

蕭振華

上海市政府編製的生活費指數，很久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與指摘，因為第一，牠是祕密編製的；第二，牠事實上離開物價很遠。

這種懷疑與指摘自然有根據。不管吳市長多麼地長於宣傳，會把假的說成真的，把死的說成活的；但事實終究勝於雄辯。工人愈來愈過不下去這個事實，總使吳市長的宣傳無所施其技了。

最近，因為南京杭州二地的物價都比上海低，但生活費指數却反比上海高，這一事實，更使人們對市政府編製的生活費指數不信，更對吳市長的謊騙痛恨了。在職工大眾的普遍壓力之下，那些主張階級合作，竭誠替政府効勞的總工會上層領袖們，也不得不出來說話了。總工會召集了生活指數座談會，後來吳市長又邀本市的勞工領袖去聽了『訓』。吳市長雖又信口開河，訓些連小孩子也騙

不了的鬼話；可是結果總算不是完全沒有，編造生活指數的內容總算透露了一些，同時，工人大眾的真正要求總算讓某些領袖說出來了。

根據市府代表的話，生活指數所依據的食品中包括了麥糟包米。正如座談會中一位出席代表說：『試問我們現在，什麼人是吃這些東西的？』吳市長的餐桌上有沒有這種食品？

生活指數所依據的項目中，沒有醫藥費、學費、娛樂費、應酬費；而且在所謂家計調查中，根本顧到一個人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不讓他有絲毫多餘積蓄；那末試問：工人難道不會生病，不死亡，不討老婆，不生子女，有了子女不許讀書，同時又絕無戚友來往，或最起碼的娛樂散心嗎？

這樣的生活費指數顯然是太不合理了。

我們在本刊上，從來主張公開生活指數編製方法，監督其編製，而且要爭到由工人自己來編製。在十月十九日的上海市總工會會議上，有人提議由工人自己組織一個生活指數研究委員會，結果通過而且組織了，這是好的。不過光研究還不够。最低限度，我們應該自己編造指數（當然在專家指導之下），每半月或一月，公佈一次，將所依據的基礎以及編製方法，統統公開出來，以便給市府所發表的不合理的與虛偽的指數做一個對照。再進一步，我們就應該要求資方完全以我們工人所編的指數為依據，憑此發給一切薪水與工資。

法國選舉意義

舒嚴

十一月十日，法國依照新憲法選出第一屆國民議會了。法國共產黨從第二黨躍而為第一黨了。說這是法國共產黨勝利，那是不錯的，但若說這是法國無產階級勝利，那就須審慎了。我們試將

共產黨和社會黨看做法國無產階級底兩個政黨，則法國解放後歷屆選舉所得票數之總和，如下表：

第一次制憲會議 選舉	九五三·三三	百分之五·五
第二次制憲會議 選舉	九三七·六七	百分之三·一
國民議會選舉 八六四·〇〇	百分之四·七	
		百分比

從表中可以看出，無論共產黨在全國黨派中佔據的順序如何，就無產階級政黨所得總票數而言，是一次少一次的，就其所佔百分比而言，也是一次小一次的。至於共產黨單獨的票數及其百分比之增加，則沒有疑義。

此次共產黨選舉勝利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是社會黨更加令人失望了，牠所失票數一部分為共產黨所得；一是『人民共和運動』內部分裂，『戴高樂聯盟』獨立起來。若連『戴高樂聯盟』票數計算在內，『人民共和運動』此次仍有五、五七三·〇〇〇票，即仍比共產黨多二二二·〇〇〇票。

議會選舉，無論如何民主，並不能完全忠實反映一階級力量對比。『人民共和運動』分裂，一面固然表示資產階級未能一帆風順，恢復戰前的地位，但他面安知不是表示資產階級已經恢復其壓迫機構（軍隊、警察、特務、法庭等）至相當程度，可以放心讓資產階級中的機會主義領袖去組織政府呢？安知不是表示資產階級要把那即將施行的種種反動步驟，叫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去負責呢？

我們已經多次領教過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政府了，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我們也領教過了。現在我們要來領教共產黨政府，或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看這些機會主義領袖，在資本主義社會上將怎樣實現奇蹟。

在大多數國家，『解放』之後六個月，局勢急劇改變了。在法國，軍費預算之異常膨脹，以及戴高樂御用的祕密警察之成立，遂造成了一種頗穩定的軸心，以對抗羣衆。羣衆回到『秩序』去了，惟有純經濟範圍偶然爆發了幾次鬥爭。正當資產階級圍繞着戴高樂而重新團結其力量時候，工人竟為『生產第一』政策所麻痺。在比利時，資產階級是以國王里奧波德為中心重新團結起來。可是我們必須指出這件事實，即有一陣猛烈的罷工潮延長了九月事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底鬥爭意志，雖然政黨領袖和工會領袖底投降政策阻止了這個鬥爭意志之表現。在意大利，資產階級終於打破了羣衆底獨立機構，很迅速地重新團結其政治力量，而專力去保存君主政制和延緩制憲會議選舉。在希臘，資產階級又將政權掌握在手中，有組織地發動白色恐怖。牠趁著一九四五年一月工人底失敗和帝國主義軍隊底駐防機會，準備着自欺欺人的選舉和一次全民投票，來重建君主政制。

與『秩序』恢復及羣衆攻擊暫時頓挫同時，資產階級又嘗試着去『測探工人抵抗潛力』，為的決定勢力對比已否改變而有利於牠。一般說來資產階級這個反攻是被擊退了的。工人底抵抗差不多處表現很有力量，資產階級不得不繼續憑藉那些改良主義的和史大林主義的工人領袖去間接統治國家。

在法國，戴高樂將軍居然成功了將『民主的』選舉和他個人的全民投票配合起來；他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最明顯地露出了拿破崙主義面孔。他有計劃地輕慢制憲會議，強迫議會，各黨以及全國接受他的意志，而且圖謀以他的行政權力完全壓抑所有獨立的立法行動，——這是拿破崙主義一個主要的特性。但是反對的力量太強大了，制止了他的極權意向，他不得不暫時退守。

在比利時，自由黨居然能於反對蘭尼所行的肅清辦法（這些辦法仍是很薄弱的）而惹起一次鬨潮。同時，真正的新法西斯恐怖也開始了，以工人政黨為對象，然而葛斯貝利政府不過比巴里政府稍微右一點罷了。各地方選舉，工人政黨所得票數佔百分之五〇以上，君主國問題延擱下來。

在意國，自由黨居然能於反對蘭尼所行的肅清辦法（這些辦法仍是很薄弱的）而惹起一次鬨潮。同時，真正的新法西斯恐怖也開始了，以工人政黨為對象，然而葛斯貝利政府不過比巴里政府稍微右一點罷了。各地方選舉，工人政黨所得票數佔百分之五〇以上，君主國問題延擱下來。

在奧匈兩國，資產階級利用了蘇維埃官僚搶劫結果造成的心靈顛覆機會，

獲得了選舉勝利。但克臨靈宮官僚底壓力以及經濟的困難，迫使資產階級不能不謹行事，不能不容忍機會主義派領袖在政府裏面。

在羅國，資產階級團結於彌雪爾王周圍，直接求援於美國帝國主義來抵制克臨靈宮官僚底壓力。

在波蘭，彌古拉乞克全線進攻，要求完全的政權。

最後，在捷克，資產階級居然成功了強迫工人接受國家對於工業的監督，并重新建立中央政府底威權。但資產階級仍不能不繼續容忍『工廠委員會』和『解放委員會』二種組織存在，前者仍在實行真正的監督生產，後者則與『正式的』機關競爭威權。

惟有在希臘，資產階級才表現得到了一種政治勝利，雖然是暫時的勝利。從『解放』以來直至現在，事變底過程，我們如果概括起來，就可得到下面的畫圖：起初是一種短期的革命爆發，散碎的，不相協調的，各自造成了一些權政制中心，而一般延長為一連串的經濟鬥爭；然後，隨着那些以機會主義工人政黨為基礎的聯合政府之設立，工人攻擊就逐漸地被阻止了；資產階級

圖謀繼續擊退工人攻勢，把機會主義領袖們逐出政權去，而強迫工人接受極權政府，——則也未能成功。第一

階段，可以說，是陷於停滯之中。

這停滯不過是外表的，因為工人階級仍保有強大的潛力，能够再起行動，其規模將比第一階段更廣大些。不過，我們切不可忘記：資產階級不僅恢復了自信力，希望，以及創意力，而且在幾個月長久的時期中我們也已看見勢力對比在許多方面都完全顛倒過來了。『解放』翌日，史大林主義者被視為資產階級底真正救主，現在則受極右派報紙所猛烈攻擊。陳舊的辭句，如『共產主義危險』，如『俄羅斯災禍』，不僅重新出現了，而且恰恰出現於『共產主義危險』（即羣衆底壓力和創意）事實上減少了，而資產階級所改組的新法西斯團體已出現了的時候。在法國，當戴高樂辭職引起的政治危機時候，列克列克軍中的軍官竟搗毀一次社會黨會議，打傷了社會黨老領袖布拉克。在比利時，當

國王問題爭論時候，共產黨總部幾次險被炸毀。在意國，一種有系統的恐怖施行，乃是『無產階級暴行』所『惹起』的。事實上，正因為無產階級沒有任何

這裏又加一次證明了那些人底話是膚淺的，即他們常說：『資產階級暴行』乃是『無產階級暴行』所『惹起』的。

直接的堅決的行動，正因為有此行動可能時候而沒有此行動，資產階級才能恢復其力量，才能以其自己組織的恐怖去回答機會主義領袖們底猶豫和怯懦。

工人政勢究竟爲了甚麼原故而暫時停頓呢？我們果真能說『暫時停頓』的話麼？或者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歐洲各國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將在此『時代』中或多或少穩定下來？——這是我們必須仔細檢討的問題，然後我們才能決定次一時期的方向。我們試拿現時工人政勢之停頓去同一九一八年後類似的一年停頓比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除德保二國以外，革命運動都是於一九一二年達到其最高點，以後雖有若干波折，總是退潮了，最後於一九二三年達到穩定。托洛斯基在『新階段』一書中列舉其原因如下：（一）工人失敗造成了革命潮底最低點，加強了資產階級底國家機構和自信心，耗竭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精力。（二）更重要的是戰後相對的經濟繁榮，雖於一九二〇——二一年間遇着短期的經濟恐慌，但此時革命潮已經開始低落了，恐慌渡過更加緊退潮，而達到一九二三年以後的經濟穩定。

我們無需要深刻研究現在歐洲經濟狀況，便可看出，除了比利時以外，沒有一國羣衆運動暫時的停頓是可以拿暫時的經濟穩定來解釋的。也不可以拿戰時經濟繁榮之延續來解釋，因爲大陸上沒有一國有此繁榮。恰好相反，每個國家，經濟的完全停滯正構成了資產階級所遇困難之主要源泉，正如物價高漲和工資凍結間之乖離，時處處構成工人行動之最重要的刺激力一般。我們知道，一九四五年一月的生產指數，與一九三八年相比，在荷蘭爲百分之六〇，在法國爲百分之五〇，在希臘爲百分之三五，在南斯拉夫爲百分之三〇；重工業生產力，在捷克現在祇有百分之二五；意大利現在則有四百萬人失業。由此可見，拿相當的經濟改善來解釋工人之暫時停止鬥爭，——是何等膚淺的了。

他方面，工人失敗也未曾達到喪失革命精神和鬥爭意志之程度。在這方面，希臘情形是很可作證的：希臘是唯一的國家，工人戰敗了，資產階級得到了完全的政治勝利，可是我們又看見新的強有力的經濟鬥爭浪潮興起來，牠似乎要成爲革命鬥爭新階段之序幕。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倘若我們注意到：（一）無產階級無論何處都未曾使用其完全的力量從事於普遍的鬥爭；（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勢力對比根本上還是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三）資產階級尚未能重建其國家經濟，連有限制的重建也未曾有繼續之到來。整個的客觀局勢，無論經濟的或政治的，都推進工人階級走向這第

二階段。歐洲革命第二階段之爆發，將視工人階級能否自覺地排除機會主義領袖們，首先史大林主義者們，以爲斷。

在工人鬥爭底第一浪潮中，羣衆是在完全信任史大林主義領袖之下加入鬥爭的；史大林主義者被視為政黨領袖和工會領袖。正是羣衆這種信任，構成了第一階段鬥爭底主要推動力，以及此鬥爭陷於停頓的主要原因。羣衆被領袖們勒令回家去之後，一定會明白：所謂『解放』對於他們就是繼續困境之意。羣衆心理的反應是很複雜的：首先是對於史大林主義的深刻失望，但隨之來的也有一種頹喪，其表現就是漸漸不信在一切工人政黨，就是加強工團主義傾向（但常常發生於官式工會之外），就是愈來愈加懷疑鬥爭底可能性。如工人運動史上所看見的，這類情緒倘若發生於經濟局勢惡化，資產階級政治上薄弱無力，而世界工人階級和殖民地人民又日益增加壓力時候，則不是預告完全的銷沉，而是預告將有一種新的強有力的自發鬥爭浪潮興起來了。

這裏，有其他的歷史事實可供類比：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德國局勢（三月事變以前）和一九三三——三四年西班牙局勢（二月事變以前）。在以上兩種情形，我們都看見了一個革命潮被傳統的工人政黨之機會主義政策所撲滅；都看見了資產階級反攻遭遇工人意外的抵抗而未能達到其目的；都看見了經濟局勢惡化成爲最強大的推動力，刺激工人去行動；都看見了以前的失敗並不喪失工人鬥爭意志反而加強工人革命精神；都看見了革命鬥爭底新階段，一種特殊形態的階段：以守勢開始而過渡到攻勢，以後攻勢失敗了，因爲革命黨薄弱弱無力，但轉過來又成爲一種過渡的階段，走向普遍的革命潮（德國在一九二三年，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歷史的類比是有一定界限的，但我們甯願借助於這兩種情形來解釋現在的歐洲局勢，却不願借助那一種『相對穩定』情形。

當『解放』時候，小資產階級跟在無產階級背後走，無產階級則領導着進攻。法西斯精神好像死滅了。蘇聯和各國史大林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間階級有了受大紳資本壓迫之經驗，這壓迫在許多情形下不啻表示中間階級社會上的無出路，這經驗是痛苦的，所以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分子傾向於經濟上社會主義的改革。『民主』精神在中間階級內以一種新的建設性的形式活躍起來。工人運動中那些職業的糊塗蟲所有『以經濟民主補充政治民主』的『思想』，事實上正是從那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借來的。

試結算『解放』後一年或一年半期間內各種選舉比例，我們就可看出小資產階級底根本改變。小資產階級的『左傾』組織，從抵抗運動生出來的，浮泛印着『社會主義』性質的，好像都已死滅了。對於下面諸種組織說來，尤

其明顯：比利時的UDF、法國的VDSR和MURP、荷蘭的尼德蘭人民運動。意大利的行動黨底殘餘加入傳統的工人政黨，與資產階級重新團結為政黨同時，那些中間階級紛紛加入了那些黨派，牠們在各自的國家是忽然表現為最有力的黨派的。例如比利時的PSO、法國的MRP、意國的基督教民主黨、波蘭的農民黨，巴威爾和奧大利的人民黨，匈牙利的小業主黨，希臘的人民黨。

這些「中間偏右的黨派」，其混雜的政治組織有甚麼一般的通性可言麼？這些黨派都是小資產階級底中途站頭，牠們都很清楚反映歐洲政治生活底過渡階段。就牠們的某些思想特性說，牠們是經過其「左派」代表圖謀繼續「抵抗」、「進步」、「民主」等精神的，但就牠們的另一些思想特性（如反共，如宗教的保守性等）說，則牠們經過其右派代表發現牠們與真正的新法西斯組織有自然的連繫：如比利時的利奧波德極端派，法國的PR、極右派，意國的「普通人運動，希臘的「Chi」運動，以及波蘭的Armia Krajowa。

小資產階級之回到右邊來，自然是受好多因素影響的。在紅軍佔領的國家中，史大林黨爲了贊助克臨密宮官僚底搶劫，敗壞了自己威望。在意大利，二十七年前產生法西斯的那些因素，現在又集合在一起了。在比利時，國王問題和銀行凍結問題有很大影響。但是，一般說來，小資產階級從中間偏左移到中間偏右去，是反映下一事實，即政治創意力已從無產階級轉到資產階級了。

他方面，從這些中間黨派厭棄（至少官式地）政治上極權手段看來，從牠們與抵抗運動的思想連繫尚未斷絕看來，從牠們着重「民主」，常常拿「民主」來對抗工人領袖之「反民主的」手段看來，可見小資產階級尙未會確定地轉移到資產階級營壘中去的。無產階級再來一次攻勢，將再分化那些中間階級。中間偏右的黨派將瓦解。其中左派將有好多層次再接近於工人階級，將恢復和加強法西斯組織。大資產階級一經獲得其自己的壓迫機構，而經濟的和社會的條件又危害了資本主義制度時候，牠就可以多多拿錢來供給新法西斯「領袖們」以回答無產階級羣衆底每一次行動了。此時，大資產階級祇有一種困難必須解決，即：挑選新法西斯領袖，——因爲倘若我們仔細研究歐洲各國底政治局勢，就可發現，現在政治舞台上，已不是一個人物而有好多人物可以求當明日的道里奧，明日的莫索里尼，明日的德格勒爾了。在這個意義下說來，法西斯危險已經存在於整個大陸了。

暴風雨前的寂靜，——這便是歐洲大多數國家現時的狀況。無產階級靜默地記下了階級敵人底侮辱和挑釁，牠想著因「解放」而獲得的東西是怎样被人騙取了去的，牠明白所謂『生產第一』政策不過是替大托辣斯生產額外利潤罷

了，牠的生活水準仍是凍結於最低限界的，牠記下了史大林主義『領袖們』一切投降行爲，牠並不認爲自己受那些工會領袖所拘束，他們除了逃避鬥爭外沒有做甚麼事情，牠經過幾年戰爭和貧困已感精疲力竭了，現在需要和平和安靜，不肯輕易起來鬥爭。然而爆發是到處積累着的。資產階級底弱到了的國家政權和機會主義領袖底減輕了的說服力量，雖然拚命阻止爆炸，但祇消某處落了一點火花，這些阻止力量將煙消雲散了。每個國家，無產階級都在等待希望和攻擊之信號。牠等待着證明這鬥爭確是值得去努力的。新的革命潮，無論發生於何國，都將普遍於整個大陸。

但不僅如此。當一九四三—一四年歐洲開始第一次革命潮時，惟有這大陸的工人階級在前進的。遠東和中東還在受日本和英國兩帝國主義堅強的統治。英美兩國帝國主義國中，『民族一致』，無內顧之憂，可以來救援歐洲諸『解放』國動搖了的資本主義。現在情形完全改變了。遠東，有好多殖民地民族暴動起來。大英帝國對印度的統治顯然要喪失。在英國本身，羣衆左傾將因印度革命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而劇烈起來。在美國，工人攻勢已達到空前的程度，軍隊士氣底低落，使之難於被利用做大規模的反革命武力。以前歐洲還是世界革命唯一爆發的地方，現在則是許多地方中之一個了，而且還不是革命火燄燒得最高的地方哩。但是其他大陸革命鬥爭對於歐洲工人的鼓勵還不是唯一的因素，使現在局勢比第一階段時更有利於大革命哩。從主觀方面來說來，也有好多進步可言的。歐洲無產階級雖然還未同史大林黨決裂，總已更多懷疑牠，更多準備不依賴牠而行動了。革命的組織雖然還是非常微小的，但已有機會加強自己，已增加其與羣衆的聯繫，而獲得寶貴的經驗了。牠們的力量和牠們的使命中間仍然是不相稱的。然而新的羣衆鬥爭浪潮起來，那些大的工人政黨漸漸分解，將根本改變革命團體生長的速度，把算術級數之變化改爲幾何級數之變化。牠們之間國際的團結，將證明是一種有歷史重要性的因素，在全大陸的新革命浪潮光耀之中。凡固不合其自己理想而抹殺歐洲革命的人，將再有一次明白：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畢竟高於小資產階級的印象主義了。

當然，沒有人能預言無產階級底迅速勝利。記住革命黨薄弱無力這個事實，就可知道，歐洲革命第二階段，規模和成績雖將超過第一階段，仍有可能停止於中途的。新的衝突，新的退守，新的攻擊可能繼續發生。那時將更有利於第四國際各國支部之生長。不可能相信，到了一切最有利的條件又集合一起以推翻腐敗的資產階級之情形下，如德國在一九二三年時候，第四國際之生長還是不充足的。人類之命運正依賴於第四國際之生長。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

論 官 僚 運 動

唐盛

戰爭末期以及戰後一年以來，中國民眾從多年昏睡中漸漸覺醒了，已經能够公然表示其不滿現狀之意，而且好幾次以行動向這不滿人意的現狀提出抗議了。至今為止，覺醒的民眾還祇限於反對現行政制而要求一種民主政制。現行政制在此期間所表現的貪污，無能，橫暴，腐敗，顛頽等等，同火上澆油一般，更加激起民眾底憤怒，更加推動民眾去要求民主政制，較民主的政制，來代替牠。這本是一種革命運動初起時必經的階段。

不知何人在此時提出了『官僚制度』名詞，把現行政制，以及此政制所表現的貪污，無能，橫暴，腐敗，顛頽等等，統統稱之爲『官僚制度』，而把初醒的民眾引到反官僚運動上去了。不知何人首先提出了『官僚制度』名詞；

但是政論界中給這個名詞以系統解釋，替反官僚運動建立理論基礎，做得最好的人，我們卻知道了，那就是陳人白先生，他在某巨型雜誌發表了『論官僚制度』和『論官僚資本』二文。

這位反官僚運動理論家，可惜，不僅不會引導民眾鬥爭前進一個階段，反而要使民眾陷入歧途。爲求真理起見，我們是不可不辯的。

所謂『官僚制度』是甚麼？

陳人白先生從歐洲歷史和中國歷史兩方面來說明他所謂官僚制度。他說歐洲官僚制度起於羅馬凱撒時代。那時，『從中央到各省各州各縣乃至各殖民地，都有各種各式的官吏。那些官吏從上至下地，一級一級地管轄下去；從相反一方面說，那些官吏們又是從下至上地一級一級地服從上面，一直到凱撒爲止。這整個官僚機構，有如一個金字塔，底層是奴隸，佃奴及一般平民（如手工業者及小商人等），塔身是各級官僚，而站在頂項上的便是凱撒。』他說羅馬滅亡後，在封建時代，官僚制度就沒有了。但到了十六世紀以後，君主專制時代，『官僚制度又重現於舞台』，『這一制度本身的結構（金字塔式的結構）是與古羅馬的官僚制度一脈相承的。』他說君主專制崩潰後，在資產階級民主政制上昇時代，官僚制度又沒有了，但到了這個政制衰落時代，資產階級就『逐漸地從歷史的陳列所裏把古舊的官僚制度搬出來作爲自己統治的輔助工具。』他又說資產階級未曾完全放棄民主政制時，『官僚制度當然不會獲得充分的

發展。』必須等待資產階級完全放棄民主政制而轉向極權政制時，官僚制度才有了『登臺造極的表演』。根據以上歐洲歷史的分析，他下斷語道：『官僚制度明顯地是寡頭君主或領袖專政的必然產物。』

這一斷語，他說，同樣也是可以應用於中國歷史的。『中國官僚制度的一般性質，當然與歐洲的官僚制度大體相同。但由於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之亞洲式的特点，便賦予我們的官僚制度以一種亞洲式的特性；同時又因爲這種制度在兩千餘年來連續不斷地存在和發展（像歐洲古代羅馬的官僚制度便中斷了千餘年，到十六七世紀才又復現出來），也就更具有一種特殊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了。』

如此，陳人白先生把官僚制度——歐洲的和中國的，古的和今的——僅僅視爲寡頭君主或領袖專政底產物，僅僅拿來聯繫於專制或獨裁，但同民主對立起來。

這裏含有兩種錯誤：

第一，把古代凱撒政制，近代君主專制政制，當代法西斯政制，以及中國秦以後二千多年的政制，統統納於一個範疇之內，——是錯誤的。這幾種政制之間，其階級的基礎何等不同，其歷史的作用何等不同，其後來的歸宿又何等不同，即使有若干共同點，如陳人白先生文內所指出的，那也是形式的意義重於實際的意義。反對一種政制，重要的是反對牠的實質，而不是反對牠的形式。現在正當民眾覺醒反對那不滿人意的現狀時候，陳人白先生，不來摹擬現行政制底實質，其所以異於其他政制的特點，反來分析一種超歷史的形式，即若干不同政制所共有的形式，結果是要模糊了民眾對於現行政制的認識，而使運動陷入歧途的。

第二，把官僚制度僅僅聯繫於專制或獨裁，而同民主對立起來，——也是錯誤的。姑拿歐洲近代歷史來說罷。近代歷史既是資產階級及其政制底發展史，那麼近代官僚制度至少是同一階級基礎的幾種政制之產物，因之其共同點就含有更多的實質的意義。但就近代歷史說來，君主專制崩潰之後，官僚制度果真斷絕一個時候了麼？在民主政制上昇階段，果真沒有官僚制度麼？官僚制度果真等待資產階級衰老以後，放棄民主制度時候，才被拿出來使用麼？我們的回答是與陳人白先生底不同的。

恩格斯曾說法國是近代諸種政制後先繼起表現得最明白的地方。很奇怪的，陳人白先生不拿法國做例，偏拿英國做例，來說明官僚制度演變。若是拿法國做例的，他便不能說君主專制推翻後，官僚制度就斷絕了，也不能說民主政制上昇階段沒有官僚制度了，更不能說須待資產階級衰老，放棄民主制度時候，才「從歷史的陳列所裏把官僚制度搬出來」了。

事實上，從君主專制時代起直至現在，法國並未斷絕官僚制度，而且每經一次革命，官僚制度都更加强大起來。『舊政制』(Ancien régime)推翻之後不久就有拿破崙帝國，拿破崙失敗之後『王政復興』，『七月王朝』被革命推翻之後不久又有第二帝國，巴黎公盟以後更有第三共和國。以上諸相續的階段，官僚制度都是更加發揚光大的。為甚麼呢？列寧回答道：『集中的國家政權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這政權在封建末期長大起來。有兩個制度尤其表明這個機構底特性，即：官僚制度和常備軍制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我們不止一次發現他們說起：有幾十條線索聯繫這兩個制度於資本家階級。』『官僚制度和常備軍制度乃是資本主義社會機體底一種「寄生物」，這種寄生物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鬥爭產生出來的，卻阻塞了這個社會底生存毛孔。』『自從封建衰落以來歐洲發生的革命中，官僚的和軍事的機構是着着發展，完備，而且加強的。』(均見『國家與革命』)列寧說，從封建衰落起，官僚制度是愈來愈發展愈完備愈加強的。陳人白先生則說，君主專制推翻後，實行民主政制，官僚制度就進入歷史陳列所去了，須待以後放棄民主政制，才從歷史陳列所搬出官僚制度來。這兩種相反的說法，究竟誰對誰錯呢？我們想列賓是對的。那麼陳人白先生為甚麼會錯呢？

陳人白先生所以錯誤是由於他給官僚制度以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他用超歷史的眼光去看官僚制度，而不明白我們現在面對着的官僚制度乃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底兩大制度之一。』他不明白，這個國家政權，無論表現為『寡頭君主』或『領袖專政』，無論表現為上升期的民主政制或下降期的民主政制，都是不能脫離官僚制度的。他不明白這一切，所以硬派官僚制度做專制和獨裁底產物，而拿來同民主對立了。

所謂『官僚資本』是甚麼？

『官僚制度』是舊的習見的名詞，但『官僚資本』則是新的陌生的名詞。我們以前早已有了『國家資本』『金融資本』『工業資本』『商業資本』『民族資本』等等名詞，但還沒有『官僚資本』名詞。據陳人白先生說，『官僚資

本』是最近馬寅初教授特別而公開地提出來的。可是馬寅初教授自己說：『我對於官僚資本做不出甚麼定義。』一個新提出的名詞，提出者自己也做不出甚麼定義，那就沒有辦法了。幸而陳人白先生有了辦法。他代替提出者馬寅初教授給『官僚資本』做出一個定義。

那麼甚麼是官僚資本呢？陳人白先生說道：『首先，官僚資本只是官僚制度下的一種產物，正如官僚制度只是寡頭專政下的產物一樣。但兩者之間也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凡有寡頭（不管君主或領袖）專政的地方一定要產生官僚制度，但有官僚制度的地方不一定產生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只是在某一定歷史階段和某種社會環境的官僚制度下產生的，換句更具體的話來說：官僚資本乃是資本主義時代某些落後國家的官僚政治下的產物。』

陳人白先生把他這個『定義』應用到目前中國來，當然要說，目前成了『衆矢之的』的，『人所側目』的官僚資本，不過是中國落後性的產物，不過是土耳其的，波斯，甚至日本所發展的或所會發展的一樣的，不過是自從李鴻章以來官辦的產業之發展和擴大罷了。

果真如陳人白先生所說的，那麼目前的『官僚資本』是古已有之了，至少從李鴻章以來就有了，而且不是中國特殊的產物，而是土耳其，波斯，甚至日本等落後國家底共同產物了。如此古老，如此普遍的現象，為甚麼到現在才有了名稱叫做『官僚資本』呢？為甚麼這個新名稱，連提出人都『做不出甚麼定義』，須勞陳人白先生來做出這麼一個老生常談的定義呢？如此古老，如此普遍的現象，為甚麼現在忽然『差不多已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扼住了一切民營企業的咽喉』呢？忽然有了如此氣魄，『將蠶食整個國家的僅有財富，摧毀一切民營企業，吮盡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國民生活於離奇古怪萬劫不復的深淵』呢？這些問題，陳人白先生那個『定義』是不能給我們圓滿解釋的。我們試從另一觀點來解釋牠們。

首先，我們應當認識，中國所謂『官僚資本』乃是新的現象，至多不過『抗戰以來』那麼年數罷了。自從抗戰以來，中國國際地位開始新的變化。以前，中國是好幾個國家共有的半殖民地，以後則由共有漸漸轉變為美國一國獨有，抗戰勝利，這轉變過程就確定完了。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正在依照這個新的國際地位而實行改造。所謂『官僚資本』正是這個改造底產物。美國金融資本要單獨『開發』中國。但英國『開發』印度和日本『開發』朝鮮，用的方式已經過時了，現在有新的方式，以前曾小試於菲律賓，現在要大試於中國。這方式，就是利用既成的政治力量來支配全國的生產，統一的支配而

非分歧的支配，間接的支配而非直接的支配。政治是獨立的，但經濟底最後決定權操於華爾街諸大亨之手。

改造過程是相當痛苦的。這個『官僚資本』（即經過中國政治力量媒介的美國金融資本）以雷霆萬鈞之力俯臨舊的適應於多國共有的半殖民地經濟，瓦解之，吸收其合用的成分，而排除其不合用的成分。這個過程震驚了中國的人

，因為確是以前未曾見過的，確是民莫能名的。中國古典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元老馬寅初博士，首先起來大聲疾呼反對這個過程，首先『特別而公開地提出』『官僚資本』名稱，而且說『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資本，發展民營事業，如果太遲了，要反對也不可能……』——這難道是偶然的麼？代表『民族資本

』（即過去在多國共有的半殖民地經濟中尙能相當獨立的資本）的馬寅初博士，自然更早感到切膚之痛，但他畢竟不是站在中國民眾立場來反對美國金融資本本身，他是站在民族資本立場來反對美國金融資本經過中國政治力量的運用，所以提出『官僚資本』這個不很妥適的名稱，卻不能給予一個圓滿的定義。

由我們這個觀點看來，那麼『官僚資本』（我們姑沿用馬寅初博士提出的名稱罷）忽然能掌握整個國家經濟命脈，能扼住一切民營企業咽喉，能蠶食整個國家僅有財富，能蠶盡一切民脂民膏等等，就不難解釋了。

陳人白先生可以反駁道：倘若中國沒有官僚資本舊基礎，即使美國金融資本進來，也不會發生現在這種『官僚資本』的；我也未曾忽視美國金融資本底作用，我不是說過『官僚資本』企圖將中國的經濟命脈寄託於太平洋彼岸的金元帝國以便中國對外關係的單元化麼？不是說過牠『對外盡其實辦之能事，發展外來資本的勢力，務使中國在經濟上完全隸屬於一個新的主人，一個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麼？如此，我們仍可以把現在的『官僚資本』看做李鴻章以來官僚資本，受了新因素影響，特別發展和擴大的。所以我又稱之為『新官僚資本』，以別於李鴻章以來的舊官僚資本。

但這反駁仍是以中國『官僚資本』為主動的，仍說牠『企圖將中國經濟命脈寄託於……金元帝國』，牠『務使中國在經濟上完全隸屬於……一個最強有力的帝國主義。』事實上是美國金融資本已經造成了局勢，使你不能不『寄託』，不能不『隸屬』了。我們並不否認中國舊的經濟體系，即所謂官僚資本舊基礎，便利於美國金融資本底新工作。但這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有此舊基礎固然便利，無此舊基礎，美國金融資本也是不難創一個的。試看非律賓。今年七月四日『獨立』以前的非律賓，是『純粹的殖民地國家』，照陳人白先生說來，這種國家是應當『除外』的，是沒有『官僚資本』的。可是美國金融資

本照樣能經過羅哈斯政府在菲律賓造成一個『官僚資本』或『新官僚資本』。『新官僚資本』不僅無需以『舊官僚資本』基礎為前提，而且無需以寡頭專政為前提。仍以中國為例。中國現在固然是寡頭專政，但是倘若明天『聯合政府』成立了，民主政制實行了，難道中國民族資本能單獨發展以消滅『官僚資本』麼？

陳人白先生底錯誤，在於過高估量舊的官辦企業底作用，而無視或忽視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這個新事實。

如何反對『官僚制度』和『官僚資本』？

民衆開始覺醒時，最足激起民衆憤怒的是現行政制所表現的種種貪污，無能，橫暴，腐敗，顛倒等事實。人們說，這些事實是『官僚主義』，或『官僚作風』，是現行政制所不能避免的，要反對這些事實，就必須反對現行政制本身，而要求一種民主的，較民主的，政制。人們領導民衆做這反對『官僚制度』的運動，這運動是進步的，我們擁護牠，因為牠能促進民衆從反對現行政制的鬥爭更進一步去認識一切資產階級政制都是腐敗的等等，都有『官僚作風』，因之要求民衆自己的政權。

全國經濟生活歸若干所謂『公營的』公司壟斷，人們說這是『官僚資本』作祟，人們領導民衆做這反對『官僚資本』的運動，這運動也是進步的，我們也擁護牠，因為牠能促進民衆進一步去認識『官僚資本』底本質，去認識反對現行政制是不够的，必須兼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身。

我們擁護上述意義的反官僚運動，因為這是一種過渡性的運動，能使羣衆鬥爭從較低的階段不斷進於較高的階段，而不預先限制鬥爭底範圍。

可是像陳人白先生那般，將反官僚運動『理論化』，給予『官僚制度』和『官僚資本』以那種系統的『解釋』，那就更陷民衆鬥爭於歧途了。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他的『解釋』是錯誤的，而且指出錯處在那幾點，此處不再重複了。此處，我們祇要說：如果照他所解釋的去做反官僚運動，則反對『官僚資本』僅僅歸結於反對『官僚制度』，而反對『官僚制度』又僅僅歸結於反對寡頭專政。換一句話說，陳人白先生把現在富大希望的『反官僚』運動預先限制於反對寡頭專政的範圍，或『民主化』的範圍，或所謂『徹底民主化』的範圍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問題和根本改變資產階級政制（無論是獨裁的或民主的）問題，在這個範圍內是沒有位置的。然而這兩個問題是認真的反官僚運動所不能避免的，因為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就不能認真反對『官僚資本』。

，不改變資產階級政制也是不能免除『官僚制度』的。這兩個問題，是凡將『反官僚』運動理論化或系統化的人所必須明白提出的。

但若明白提出上述兩個問題，則『反官僚』運動就可以解消於其他的為我們所熟知的運動裏面了。

『反官僚』運動，在中國，就是『獨立解放運動』，亦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正是為了這個原故，所以雖在『官僚制度』極端猖獗的國家，如在莫索里尼治下的意國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國（陳人白先生說：『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專政，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官僚制度之登峯造極的表演。此種法西斯專政下的官僚制度，比起古代君主專政下的官僚制度來，顯然含有許多特異之點，但就它的殘暴方面說，不僅和以往

的官僚制度相同，而且是所有一切官僚制度中之最兇橫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從未將『反官僚』運動理論化或系統化，因為在系統的理論的意義上，反官僚運動本是與無產階級革命相一致的，無須特別提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者，惟有在蘇聯，系統地理論地提出『反官僚』口號，做着『反官僚』運動。為甚麼呢？因為，惟有在蘇聯，官僚制度才能視為『社會政治上一個贅疣，一個瘤』，割去此贅疣或瘤之後，社會政治仍能是健康的。所以，在蘇聯，馬克思主義者不反對社會政治制度本身，而僅僅反對其中的『官僚主義』。

在其他國家，則官僚制度就不是可以割治的贊疣或瘤了，而是從機體腐朽生出的爛瘡，是不能割治的，是祇能跟隨機體本身消滅而消滅的。所以，在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官僚主義』，就須反對社會政治制度本身。

在中國，如果把『反官僚』運動從反對社會政

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且自命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政黨，在美國是不少的；不過就主要的說，却只有三個：社會主義黨，共產黨，社會主義工黨。這三個政黨在橫的方面是信守着三種不同綱領的流派，但縱的方面却代表着美國無產階級政治覺醒的三個階段。

本文目的不在於研究美國工人政黨的發展史，而在於認識美國無產階級先鋒隊政治覺悟的經歷與程度，所以對於這三個政黨的史實方面，我們祇能作一簡單敘述。

和一切其他的文物思想一樣，美國的社會主義，也是從古舊的歐洲流傳過來的。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初，歐洲大陸上的三派社會主義即：馬克思派與拉薩爾派，後來又加上了巴柯寧派，都被一些在歐洲遭迫害的亡命客帶到新大陸來。一八七二年，第一國際的總理會決定搬到紐約；但這在事實上並沒有發生什麼大的作用，最初大活動的倒還是拉薩爾派。他們在一八七四年在衣利諾州組織了美國第一個『勞動黨』，同年，又發生了『社會民主工黨』。一八七六年，『社會民主工黨』，聯合了其他兩個組織，會同第一國際理事會，組成了『合衆國工人黨』。次年，馬克思派與拉薩爾派聯合組織了『北美社會主義勞動黨』，這個黨一直繼續到一九〇一年。

在十九世紀末了的二十餘年中，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始終在少數急進知識份子與新從歐洲來的流亡工人這個小圈子裏打轉，跟美國的工人大眾沒有多大關係。同時在思想上又是混亂得很：拉薩爾派主張專做政治活動，不管工會的是否存在與發展；自命為馬克思派的完全趨向於議會活動與工會的經濟鬥爭；服膺巴柯寧的則要實行『暴力的直接行動』，這傾向後來又被法國來的工團主義的勢力所加強了。美國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便在這三種思想中徘徊，選擇，製造了不少錯誤，碰到了很多釘子。結果，總算馬克思主義的一派勝利了，他們在一九〇一年組成了『社會主義黨』。

這個黨是第二國際的美國的一支。牠根本排斥了美國初期社會主義運動之特徵的盲動的暴力主義，牠採取了走向工會的羣衆路線，採取了議會鬥爭的政治方式。牠使社會主義運動在美國的工人中總算生下了根，使黨員在十一年間達到了十一萬八千人，使社會黨的選民在一九一二年獲得了八十九萬七千人。這一點，不能不說是美國『社會主義黨』的功績。不過另一方面，牠把美國傳統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完全拋棄了，陷進了議會主義與階級合作的深淵，剛至在一九一四年以後擁護帝國主義的大戰，這却是牠的罪惡了。對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美國『社會主義黨』最初站在虛偽的和平主義的立場上加以反對，後來，等到美國一參戰，許多領導者索性就公開擁護了。這立場，使牠大大地喪失了信用，黨員數從最高的十一萬八千人（一九一二年）慘跌至二萬六千人（一九二〇年）。因為右傾的公然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而左傾的則因失望而另尋出路了。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下）

劉 眇

治制度本身的運動分裂開來，那就等於承認這社會政治制度本身是健全的，是無需反對的，祇消割治

官僚制度『贊疣』罷了。古典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元老馬寅初博士就是站在這個立場上的。

馬寅初博士站在這個立場上是可以原恕的。

讀者 通信 國民大會口號質疑

(一)

編輯先生：

……說到國民大會的號召，我覺得你們是跟從別人後面散佈幻想。你們自己也明知其不可能而故作此說。雖然以這個理由來辯護自己，也是不可以的，即：『並非看重牠是一個完美的機關的靜的一面，而看重牠能喚起廣大羣衆的政治覺醒的動的一面。』誠然，使廣大羣衆能達到政治覺醒的每一個可能性，革命黨都不可放過。但事情如果是屬於虛幻的時候，祇有弄得更糟些吧了。國民大會無論召開不召開，牠總只是一個政治欺騙，以美麗的外衣來掩飾了的欺騙，我以為除了指出牠的虛偽，暴露牠的實質之外，用不着也來說許多應如何如何開法的話。這乾脆的是空話。

現在各式各樣的民主派，即所謂『中間派』，很時髦地在談國民大會開會問題，不是嗎？這正是他們幹的事。你們應該站在他們的左邊，越出他們之上。

如果說要『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在國民大會裏選擇着社會機構，解決國事，這樣說是把階級鬥爭也說得含糊起來了。

把你們對國民大會的召開的主張，比之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確是有些相似。都是以美的名

受着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美國『社會主義黨』分化了，發生了左派，由此，後來又組成了美國的『共產黨』。

不過社會主義黨還是繼續存在，只是保守得很，羣衆更少，小學教員聯合會這類的組織做了牠的一個重要基礎，牠和產業工人大眾更離得遠了。當一九三三年經濟大危機之後，隨着工人階級的左傾，社會主義黨雖然又左傾了一個時期，但是有限得很，也短暫得很，不久，社會主義黨又回到牠古老與腐透的機會主義立場上去。在這次大戰中，美國社會主義黨的立場連虛偽的和平主義都不要了，牠赤裸裸地擁護華爾街巨頭們的戰爭。在戰後，這個黨繼續擁護羅斯福一系的民主黨的『左派』，牠希望靠『開明』資產階級的力量來打擊反動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

這個黨是過去了，牠事實上是美國資產階級（至少牠的『左派』）的尾巴；在未來的鬥爭中，牠是祇能盡着消極的反動作用的。工人們正在大量離開牠。例如，在最近的紐約州長競選中，社會黨的候選人祇獲得了一萬四千的簽名支持。

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在一九一九年九月開始具有組織形式。從社會主義黨分裂出來的左派，又分成了三派，都以共產主義者自命，三個共產黨同時存在着，相互間進行着激烈的鬥爭。但雖如此，也引起了美國統治階級的驚恐。社會主義黨左派自行組織共產黨之後兩個月，聯邦政府的檢察處便採取了最嚴峻的手段來對付他們。一切共產主義者都隱到地下了。大批被捕，成羣地被逐出國。這樣的反動浪潮延長了兩年，直到一九二二年初，那個業已在地下統一了的（一九二〇年五月）美國共產黨，才以『工人黨』的名義，又爬出地面來。

美國共產黨之產生，表示着美國一小部分前進的工人，尤其是外國移來的工人，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所實行了的學說與政策，排斥了美國社會主義黨中所執行的傳統機會主義；他們決心要把北美合衆國也變成爲蘇維埃式的勞農國家。這自然是一大進步，是美國工人階級政治覺醒歷程上的一塊大大的里程碑。但因美國帝國主義從第一次大戰中出來更加強了地位，並未受到什麼損害，資本主義制度在新大陸上並未由於崩潰，却反而露出了光輝的新生氣象。美國的戰後經濟頗見得繁榮，工人階級地位亦有所改善，因此，極小部分，尤其是外僑工人的左傾，並不能抵制最大部分美國無產階級的右傾；一方面發生了共產主義，另方面的改良主義却猖獗起來了。這一客觀形勢決定着二十年代初期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無力，以及這一運動的主要生活爲內部鬥爭。美國的初期共產主義者都是些年青熱情但少經驗的革命家，他們受着俄國布爾雪維克革命的感召，鼓舞起來，猛烈反對美國式的社會主義；但他們犯了『幼稚病』，他們矯枉過正。他們排斥一切議會活動，主張成立『獨立工會』，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反對一切合法活動。圍繞在這些幼稚病的周遭進行了無窮盡的小派鬥爭，代價付出了不少，最後幸虧在列寧與托洛斯基所領導的第三國際的幫助之下，這些毛病一一給醫好了，美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路，大踏步地走向羣衆去。可是沒有幾年，新的與更大的災難降臨到牠的頭上。第三國際落到了史大林一系的手中。從此以後，美國共產黨，正和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一樣，一往不復地向墮落方面走。

在『反托洛斯基主義』的名義之下，一切具有獨立性格的，眞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遭到了打擊，以傑

，包含了矛盾的關係。在教育羣衆，在啓發工農的政治覺醒上，說工農民主專政，難道不有牠的力量嗎？但事到緊急時，像『四月』的光景，就顯示了牠的矛盾。如果現在將國大問題照你們目前的樣子說下去，其中包含的矛盾更要大到十萬倍哩！工農民主專政不過沒有指出：究竟是工還是農作爲領導者，而你們則說到全國民的普選了。『國民』中的財東，地主，小商人，以及工農大眾，如何能在國民大會中商討起國家民族社會的前途來？那不是非常明白的不可能的事麼？

你們是說過的，要『看重那喚起廣大羣衆的政治覺醒的動的方面』，那意思是說，目的並不在召開不召開國民大會，是在於提高人們的政治自覺吧！但是你們這樣做，有陷入於迷亂之嫌。因爲現在使人的頭腦裏有了對國民大會的幻想，就使他走入了被欺騙之門了，當他明白自己被欺騙的時候，恐怕這以前主張召開的人，都要被惱恨在一塊了。

或許你們以爲人們是不會這樣糊塗的吧？你們不是堅決主張着一個『徹底民主』的國民大會麼？我以爲對廣大人羣的腦海裏留印象，並不像學者之分析理論一樣，是清晰可觀的，所以應該把有混淆耳目危險的都明明白白的說出。不要以爲是策略上的運用，使自己有混同於別人的樣子。

我想，讓民主派去叫囂着國民大會吧，你們只要告訴工農：惟有組織蘇維埃，工農的蘇維埃，纔能產生自己的政權，不知你們以爲如何！祝 摆安！

(二)

高登上

十月十七日

編輯先生：

我是新族一個愛讀者，對於你們的言論都感滿意，祇是對於召開普選『國大』一點，有些懷疑。照你們的意見看來，你們也對『國大』沒有多

姆斯·坎農爲首的一部份共產主義者，因爲同意聯共黨中的托洛次基派的立場而被開除了。史大林揀中了那個右派領袖拉夫斯東作美共領袖，拚命予左派份子以打擊，結果，左派的革命者固然給肅清了，但共產黨却從此右得不堪設想。拉夫斯東派提出了他們的有名理論：『例外主義』，這是說：美國是例外，不會受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襲擊的。史大林這時不得不打擊了他的代言人拉夫斯東，因爲美國本身的歷史給了史大林一個重重的打擊。大恐慌襲擊了這個不知道恐慌的黃金之國！接着，史大林在美國也唱起了『第三時期』的高調，命令他的信徒們用『革命鬥爭』去奪取政權，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走進白宮，史大林和他們美共稱這位美國資產階級的改良家爲『頭號法西斯蒂』。

不過這樣的估計沒有被採用得很久。『第三時期』一經被『人民陣線』代替以後，美國的史大林主義者便拜倒在這位『頭號法西斯蒂』的脚下。這回的拜倒却是長久的，通過了『新政』，通過了戰爭，一直到戰後，到如今，到羅斯福業已死去以後很久很久。

史大林將美國共產黨束縛在羅斯福的腳上，換句話說，他將共產黨出賣給羅斯福，其程度之深且烈，竟有如此的：叫美共擁護羅斯福的『新政』，支持他歷屆的總統競選，全力擁護他的戰爭，在戰爭中號召工人自動放棄罷工，反對一切革命的鼓吹，最後，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甚至根本解散了美國共產黨！

其實自從一九二八年美共開除了牠的左派之後，牠早就不是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黨了。史大林主義根本上是極右的機會主義，有時加上些空洞的向左跳躍。這個史大林主義的本質在美國表現得最清楚，最澈底。自從史大林佔了第三國際乃至控制了美共之後，祇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所謂『第三時期』的盲動之後，便一直線地向右面突進，對資產階級屈服的路上走。史大林澈底發揮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將各國共產黨變成蘇聯外交的輔助工具。在美國，因爲他要和民主的帝國主義巨頭締結交情，所以竭力叫他的美國信徒們服從羅斯福，愈卑屈愈好，愈恭順愈好。美國史大林派在戰爭期中對華爾街利益服務的卑屈恭順，竟激起了改良主義的工會領袖們的鄙視。他們走得比一切老機會主義者更遠，做得比所有破壞罷工的工賊們更厚顏，他們辦自己的組織都會自動解散了的！

後來，當美蘇關係漸以戰爭接近勝利而復趨緊張之時，在一九四四年，雖然又恢復了美國共產黨，但如此出爾反爾的行爲，如此赤裸地從屬於蘇聯的外交利益，同時又仍然如此卑屈地追隨在帝國主義『民主派』的後面，美國的工人階級對牠失望了，不再信任牠了。據美共機關報自己公佈的數字，一九四三年解散的時候共有九萬黨員，現在却祇剩四萬五千了。再由最近這次紐約州州長選舉看，美共獲得的候選人簽名數人數竟較原來居少數地位的托派還少上四千名，這就很可能看出牠的衰退趨勢來。

一般說，美共的歷史命運也早已結束了。不管牠解散也好，重建也好；興隆也好，衰退也好；總之，牠是確定地不能領導美國無產階級去推翻世界上最強固的資本統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因爲史大林主義限定了牠的思想與活動。史大林官僚們的地位是愈來愈不能容許世界革命的。他們不相信美國，乃至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能够成功；同時他們也害怕成功，因爲萬一成功的話，那影響回到蘇聯來，第一個遭殃的該是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祇希望各國共產黨，尤其是美共，能在所在國形成一個『親蘇的壓力』，以他們對工人的影響來換取統治的資產階級對蘇聯的『友善』。美國現在是蘇聯最大的一個對頭，史大林

大幻想，祇因爲大家一致要求，所以你們也提出這個要求。並且你們以爲在此選過程中，可以讓羣衆得到一些政治教訓。你們所說的意見，大體上我都能同意，不過你們似乎不是篇篇作如此解釋，而在你們的文章中，常常看到有這樣的話：如何如何……是不可能的，祇有召開選舉的『國大』以後才有可能等等。我總覺得你們似乎把召開『國大』的幻想灌輸進人的意識中去了。

你們既然自己對召開『國大』，沒有幻想，那末爲什麼要把這幻想贈送給讀者呢？並且你們這個意見和你們整個理論，似乎都有衝突。或者你們可以這樣說：要求召開『國大』不是你們的原則，不過是你們的策略，可是我覺得這策略似乎對你們也是不需要的。因爲在我想來，能够讀『新報』的人，總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對社會科學有些研究的知識分子，普通的人是讀不懂的。假使能够接受你們思想，一定全部接受過來，決不會接受一半的。如果在普通羣衆中，或者這種說法是需要的，因爲不易向他們解釋。但是在這種條件之下，我還是認爲應當向他們盡量的解釋，如果他們再不明白，那就再讓他們去領受教訓好了。

最近我看了列寧著作的『國家與革命』。在這書上，關於國家和專政問題等的解釋，都和你們觀點相同，可知你們是真正馬恩列精神的繼承人。但是我在裏面看到列寧有如下的話：『他們起一種妄想，而且用這種妄想去鼓動羣衆，以爲普選制在現代的國家中真正能够表現多數勞動羣衆的意志，而能够担保這種意志的實現。』我當然不會懷疑你們對普選『國大』有妄想的，問題在我們是否應該把這個妄想去鼓動羣衆。

我的知識淺薄，不過胡言亂語，希望能夠給我多多指教！

張瑞焱上

因之尤其要效美共『謹慎些』，儘可能地『拖住』一些『民主派』，別讓全體統治階級都參加。反蘇聯線！史大林祇相信統治階級的力量，即使抱住最弱小的一派也是安心的。至於被統治階級，尤其是工人，他決不相信會革命起來推倒一切統治階級的，——雖然他本人的地位便是工人革命的結果。

如此說來，對於美國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美共也是完了。

現在要說到美國第三個較大的工人政黨——『社會主義工黨』。這就是美國的托派。上面說過，在一九二八年，美國共產黨中一小部分因同意托洛次基的意見而被開除了。這些人出版了『戰士報』，慢慢地繼續從共產黨中爭取新的份子，成立了『美國共產主義同盟』，仍舊以共產黨的一派自命。這同盟的主要任務是把第三國際的革命傳統，列寧與托洛次基的革命主張，托洛次基對史大林主義的批評，托洛次基對戰後各國革命所作的經驗分析，一一介紹到美國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這樣有系統與熱心地被介紹到這個國家來的。所以這個團體，首先吸收了許多美國最優秀的前進的知識分子。漸漸地，牠走向工人羣衆，同時因第三國際澈底墮落，所以在一九三四年，牠和另一個左傾的工人小黨『美國工人黨』合併而成『合衆國工人黨』，牠積極地參加了各種鬥爭，最有名的如明尼亞波立斯的罷工。這時候，因爲國際與美國國內的局勢使然，美國古老的改良主義黨——『社會主義黨』，發生了明顯的左傾運動，美國托派爲要接近更多的羣衆起見，乃於一九三六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黨』，在這個黨內留了約近一年，將大多數的青年，大多數的工人，爭取到第四國際方面來。此後牠便以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的名義，獨立存在着，在工人階級中活動着。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發生，和第一次戰爭一樣，給了所有的工人政黨以一個最無情的考驗。一切改良的，自命爲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政黨，全都顯露了真相，趕緊拋棄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努力替帝國主義者及其戰爭服務。其中祇有『社會主義工黨』是例外。牠屹立不動，堅持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繼續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並繼續站立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貫澈階級鬥爭的政策，企圖以社會主義革命來推翻十本主義制度，來終止戰爭。

爲了這個立場，一九四一年夏天，二十九名美國的托派領袖被控犯『陰謀以暴力推翻政府』罪，結果十八人判處了自十二月至十六月不等的徒刑；一九四三年除夕，這十八名被送進了監獄。在整個的戰爭期間，美國托派遭受了羅斯福政府的嚴厲壓迫，以致牠不得不在名義上不參加第四國際。不過所有這些迫害，正像歷史上的無數例子所昭示的，不能消滅這運動，反而助長了牠。美國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畢竟看清楚了，在危難中認識了知己，在美國那些五花八門的工人政黨，唯一地，真正唯一地，祇有托派是他們的真實的代言人，真正的代表者。他們以自己的入黨來回答了羅斯福的迫害。

尤其是戰爭結束，工人鬥爭蜂起以後，『社會主義工黨』很快羣衆化了。從來牠和美共的力量是不能比較的，托派只是一個渺小的團體，可是最近，由紐約州的選舉看出來，托派在有史以來第一次超出了史派的力量，州長候選人申請書的簽名人，竟超过了四千名之多！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簡單的事實，牠表示出了史派之被人鄙棄，托派之新生氣象，牠的無限發展的遠景。

高登瑞連二位先生：

來信所提疑問，正是好多我們的讀者所同樣感覺的，所以樂意在本刊上公開答覆你們。

首先我們要指出這一點，中國雖然不是一個有民主傳統的國家，但因客觀的民主任務沒有所解決，再加上三四十年來憲政與民主的鼓吹，一般中國人的腦子中並非沒有民主幻想的，同時也不是沒有民主根基的。目前各黨各派之統統提出國民大會口號，決不是一個任意想出來的欺騙，——即令牠本身是欺騙。

如果很多人有此幻想，或者至少，很多人可能有此幻想，同時，從執政黨起的一切有產階級黨，以及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派，都提出這個口號來利用這幻想，或造成這幻想的時候，我們，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一個極小集團，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可能有二：一、站在旁邊，生着氣，背向着那些有民主幻想的人，一味喊些羣衆未能接受的口號；二、參加羣衆的隊伍，甚至領導他們的鬥爭，把他們的分散無力的民主要求，導引到最徹底的民主口號，歸結到平等直接無記名普選產生的國民大會口號，同時再用最革命的政綱，即八小時工作制，工人管理生產，土地歸農民，民族獨立與自決，……等等來充實牠。由此使他們不致受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民主欺騙，使他們能團集在我們的鬥爭周圍，並走到超過民主的工農革命的路上去。

我們覺得，第一種態度是不對的，第二種是對的。何以故？因為倘照第一種態度，羣衆會鄙棄你，會打你身旁經過，會使你完全孤立；一個政治團體故意把自己和羣衆脫開，雖然不是絕不允許，在某些場合，革命黨所需要的

全體工人與退伍兵以就業及職業保障；三，反對一切反勞工法，反對政府破壞罷工；四，建立獨立的勞工黨；五，徵富人稅，不要徵窮人；六，由政府以一萬八千萬元建造低租金房屋；七，予黑人及一切少數民族以完全平等權；八，由工會創設退伍兵組織；九，工人階級以自己辦法回答資本家的軍國主義與戰爭；十，與全世界工人的革命鬥爭聯合起來；十一，建立工農政府。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工黨』不但說出了美國一切勞動者目前所要說的一切，而且還把這些目前的迫切要求，和較大的政治鬥爭，即為建立工農政府的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牠有辦法，有方向；有步驟，有立場；不踏空，不變節；又改良，又革命。這個黨在未來多變的美國政治中，一定能獲得廣大羣衆的信仰，並引導他們走上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大道去。

獨立的工黨與「夾攻門」的關係

那末，為什麼『社會主義工黨』不僅僅號召工人加入牠的隊伍，而還要提出什麼『獨立的勞工黨』的口號呢？是否托派覺得『社會主義工黨』還不足以領導未來的大革命，因之必須有個新的工黨出來呢？

這問題是很重要的，要回答牠，先得明白一下目前美國的政情。

我們在上面講了許多關於美國工人政黨的話。但我們必須立即讓讀者們知道，這些政黨雖然已經有了數十年的歷史，但仍舊與美國的人民大眾，甚至和無產階級大眾不相干的。任何一個工人政黨的黨員，最多也不過十多萬人。美國至今還不曾有一個羣衆性，即使是改良主義的工人黨，因此，美國的政治，始終被共和與民主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傳統政黨所操縱着。美國的普通民眾不必說，便是工人，政黨黨員，甚至是那些政黨的領袖們，一遇到實際政治，也總只是在這兩個傳統政黨中挑選：『不入於楊，即入於墨。』但因楊墨二家都是華爾街巨頭們手中的工具，於是美國的勞苦大眾便永遠跳不出美帝國主義這只『如來佛的巨掌』了。

我們在一開始就講過，如果憑數量說，勞動者的選票原可以決定一切的。那末這些勞動者為什麼不可以獨立地在政治上發言？為什麼一定要做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之一的尾巴呢？如果一切勞動者的組織聯合起來，即使鬆弛地與寬泛地，組織成一個離資產階級政黨獨立的政黨，提出自己獨立的候選人，選出完全以工人組織為基礎的工黨政府，這，雖然離社會主義革命的路徑尚遠，雖然仍不免要為資產階級所控制與利用，但至少，在工人階級政治覺醒的方向上，在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政黨相決裂這個意義上，在工人階級歷史鬥爭的道路上，更重要的，在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羣衆性的革命黨（即社會主義工黨）之形成上，都是邁進了一個大步。

可惜直至如今，美國的工人政黨與工人組織，除了社會主義工黨之外，都不懂得這個獨立的全體工人階級聯合戰線的重要。他們甯願做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不願見工人階級在組織上聯合起來，在政治上獨立起來。其實，這是美國今後政治局勢的一個中心問題。為什麼？因為今後美國政局的動向將提出這個問題並將取決於這個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和第一次大戰後的英國，有一點很相似，就是引導作戰得到勝利的那個

正是「逆流」的勇氣；不過如果祇爲了羣衆的覺悟不够，爲了他們一些具有進步性的幻想，同時這幻想又是有客觀的歷史任務作根基的，那我們便不能反對羣衆，而應該跟羣衆在一起。

羣衆說：我們要民主，要自由，要土地，要一個民主政府來代替獨裁政權；那末我們的回答應該是：好的，我們跟你們一起鬥爭。同時把他們的要求聯結起來，歸納成一個革命政綱。

羣衆說：國民大會可以解決這一切問題；我門說：不能一概而論，國民大會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能具有各種不同的權力。普通的國民大會祇能給統治階級操縱，仍舊不能解決問題，祇有由全體人民用普選產生的賦有全權的國民大會，才可能解決問題。不但此哩，一個『普選國民大會』之是否具有全權，即能否解決問題，還要看這會議實現時候國內真實的階級關係來決定。換句話說，要看那時候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工農大衆是否已經獨立地組織起來，因而能充分自由地發揮其力量以爲斷；這也就是說，要看那時候的蘇維埃的力量來決定。如果工農不會獨立地組織起來，那末他們的數量雖大，但因資產、文化、軍力等等實權統統操在統治階級手中，一切普選都仍是虛偽的。

我們這樣解釋，絲毫沒有給羣衆以幻想，因爲他們知道，要有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產生，並要這個大會能解決問題，唯一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獨立的工農組織的存在，亦即蘇維埃的存在，因爲我們從來沒說過，祇叫『普選的國民大會』一出來，什麼事情都解決了；我們總是說必須是『全權』的。如何才能有『全權』呢？我們總是說，必

政黨趨於衰落了。在當年英國，自由黨使英國獲得了勝利，但是勝利之後，自由黨却慘落了，牠的羣衆方面趨向於更右的保守黨，下層的選民則轉向了工黨。原來自由黨是代表輕工業家的黨，同時又獲得了工人的擁護。經過了戰爭，英國的社會危機加深了，階級的兩極分化的過程加速了，結果，『左派』資產階級聯合工人黨的政策自然維持不下去，這個黨的羣衆紛紛加入了代表兩極的保守黨與工黨。

美國也是一個兩黨制的國家。共和黨與民主黨，雖然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但至少由於最近十餘年來羅斯福一系當政及政策的結果，共和黨集中了較多的『經濟皇黨』；而民主黨的選民則有較多的小企業家與工人。民主黨的成分頗有點近乎英國路易·喬治時代的自由黨。范登堡們的共和黨呢，則是完全相等於鮑爾溫·邱吉爾們的保守黨。

美國現在也正經歷着深刻的社會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英國所發生的還要深刻到無限倍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以後的機會中詳論），階級的兩極分化過程也加速了。資產階級向右，小資產階級與工人羣衆向左。不過到這地步，美國的情形與當年英國有些不同了。美國至今沒有一個聯合而獨立的工黨，可以容納那些從民主黨出來的左傾羣衆。對於這些羣衆，美國的改良主義者（政黨的與工會的）與史大林主義者非但不引導他們到正確的路上去，反而說道：『你們不要離開民主黨呀，要繼續投民主黨的票。民主黨的杜魯門與貝爾納斯雖然不好，但是華萊士與伊克斯却是好的。』結果怎樣呢？最近這次議會選舉告訴了我們，共和黨大勝，民主黨慘敗，左傾的羣衆顯然陷於消極或無所措手足的境地中了。

缺乏一個獨立的工黨，其第一個不幸的後果業已看見了。今後這問題和實際政治的關係將更加清楚。
美帝國主義從這次戰爭中出來是太肥胖了，血壓高到了極點。牠需要放血，需要排洩。但牠的『血』放到那裏去呢？美國的勞動者，原因戰爭而患着貧血症了，但美帝國主義當然不願將血無代價輸給他們，牠要世界的其他地方出極高的價錢來購牠的餘血。可是有蘇聯在，牠的計劃就無法實行。爲此，牠只得和蘇聯一拚。可是貧血的美國工人是否願意再流自己的血，好讓華爾街的夏洛克們去吸干牠的淚血呢？他們自然不願，至少，在有組織的時候，是要加以抵抗的。

現在美帝國主義的內外矛盾，逼得牠非趕快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不可。因爲不然的話，牠國內的大危機絕對無法推延（談不到避免），牠國外的大對頭絕對不能就範。所以美國的全部大資產階級都認定第三次大戰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了。但要走上這條路，首先要克制國內的大敵。美國統治者知道得清楚：無論牠怎樣在宣傳上下工夫，要目前那個極願和平，急思喘息，急想改善生活的美國工人再作犧牲，那末不管用民主或國家的名義，都是不可能的。美國工人今後只能被束縛着手足不能從事第三次大戰。換句話說，要美國工人履行華爾街的戰爭計劃，必先採取希特勒的老法子，將工人（有的）的工會組織與政治組織，無論改良的或革命的，掃除得乾淨。

美國無產階級在這樣的進攻之下，會無條件投降嗎？絕對不會。他們將發揮出空前的鬥爭精神，無比的英男氣概。但要想美國無產階級這個未來的防禦戰鬥得到勝利，並轉而成爲進攻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第一步必須有一個對資產階級獨立的大規模的工黨，容納這些鬥爭羣衆，然後發展成一個正確而堅強的革命政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

須有國會以外的獨立的工農組織來給牠保證。一旦有了保證，那末國民大會便不能反對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了。如果沒有這個保證，那末我們相信，和列寧一樣的相信，『普選制』只是『一個妄想』。

總之，我們並不單單提出『國大』口號，而是提出『全權普選的國大』口號；同時我們不單單提出口號，而且叫人相信祇有國會外面的工農獨立組織才能保證這個口號的力量。

至於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與國民大會，那是不能混為一談。前者不是口號而是公式，這公式不是向大眾提出号召，而是一個革命黨對於革命發展前途的估計以及革命政權的階級結合的公式。國民大會則是一個政治口號，主要是民主性革命的中心口號，它的政治含義，如果我們暫時撇開一下社會學的方面不談，那末主要是表示兩點：一、結束過去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二、由『全體人民』起來建立新的政制。這個一切『更始』的意義是具有很深刻的革命價值的。

列寧無論主張工農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都不會放棄國民大會（他稱做『制憲會議』），在理論上，或者可以說，在宣傳上，他都主張由這個會議來建立政權（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或由牠來核准政權。國民大會祇有蘇維埃才可以並提。俄國革命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由蘇維埃制度實現出來，國民大會，即使是由普選的，也是反對工農利益的，所以結果被解散了。

中國的民主任務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這一點我們確信。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須由蘇維埃形式或也可由國民大會形式來實

如此說來，獨立的工黨問題竟關係着美國今後革命的前途，不但此哩，牠而且還決定着全人類的命運。因為在未來與必來的美國內部鬥爭中，如果資本家勝利了，跟着來的是全人類的大屠殺與全世界的奴役；反之，如果勞動者勝利了，跟着來的是全人類的解放與全世界的革命。

爲此，美國『社會主義工黨』提出了『獨立工黨』的口號，並爲牠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爲美國的托派知道，美國階級鬥爭的現階段需要這樣的一個工黨，同時，爲便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而走入最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起見，這樣一個過渡性的羣衆就是必需的。美國第四國際派這種鬥爭定將獲得羣衆的擁護，因而使牠在未來更有利的局勢中，能在短期內長成起來，長成到能够負擔那巨大的歷史任務，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布爾雪維克黨一樣。

X X X X X

現在我們關於美國工人階級的故事總算講完了，該回顧到我們的本題；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是誰呢？這回我們可以更明白地回答了，他不是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部分，更不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客，而是工人階級，他不是資產階級政黨中的任何一個，甚至不是改良主義的或史大林主義的任何一個工人政黨，而是『社會主義工黨』（托派）。因爲要使中國真正解脫美國的控制，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外，祇有靠美國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但要使美國成爲社會主義國家，必先經過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可是要使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則祇有在正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工黨』的領導之下。

現呢？我們認爲必須由蘇維埃形式的；但我們並不排斥一種可能，就是在革命蘇維埃的存在條件下，產生了革命的國民大會；再由這個『全民的』國大，批准了工農的蘇維埃專政。

如果這種情形發生了，事實上即等於國民大會解決了問題。如果不發生，即國民大會反對蘇維埃，那末蘇維埃有力量解散，有如十月革命後俄國所發生的，這也不會使覺醒了的羣衆『連以前主張召開的人都懶恨在一塊』。

如果問題還談不到革命的高潮階段，如果中國的今後還需要經歷一個『議會時期』，那末一個在野的革命黨之必須參加國會的鬥爭與選舉，更是無須多說了。

我們的回答還不充分，但因篇幅限制，這次暫行結束了，希望能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編者 十月卅日

十月敎訓

新書出版

新旗叢書之一 春燕出版社印行
定價一千五百元

此書係托洛次基一九二四年所著，解釋一九一七年俄國從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經過以及布爾雪維克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等等。當時，出版以後，會引起蘇聯共產黨內部激烈的論爭，以至於分裂。前有譯者長序，指出中國革命者必須吸取十月革命敎訓；後又附錄『三種俄國革命觀』一文，那是托洛次基遺著『史大林傳』底附錄，因與十月革命理論分析有關，譯者特爲譯出的。

小廠家工人的痛苦（工廠通信）

阿根

我們工作在一間小規模的翻沙作裏，共不過七個人，因此，我們生活的情形，很少有人注意，我們所受的痛苦，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們的鬥爭也因此孤立以至於失敗，而我們的命運便陷於悲慘的境地了。

爲了暴露老闆的狰狞面目，爲了使外界對我們的同情與援助，爲了使工友們今後鬥爭多一點經驗與教訓，需要把我們忍無可忍的處境，以及我們爲生存而鬥爭的始末告訴大家：

我們在翻沙作的情形有一點是與人不同，即：我們的老闆同時也就是我們的師父，正因爲如此，我們所遭受的壓迫與剝削，比別人更爲殘酷。幾年前我們先後以學徒身份進了這間翻沙作，拜老闆爲師，幾年來如一日，從朝做到夜，還要挨打挨罵。學師期滿時，一方面因爲師徒的名義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沒去處，故仍舊替老闆做下去，仍舊忍受着老闆的苛刻待遇。

我們老闆的出身，據說也是學徒，我們常常聽到他說他對我們已經是很客氣了，他從來沒有做過像他的師父那樣以火鉗來灼他的大腿，但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也許忘記我們仍像牛馬一樣。我們不明白，他既然會身受壓迫，何以他現在都一點不同情我們，這樣殘酷的對付我們？他現在已經不是學徒了，他的地位已經不是過去的地位了，他當了老闆了，他應該效法他的師父了。我們想，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的。

在火爐旁邊，在沙堆裏，我們終日蹲着，不停地翻來翻去，爐子裏發出來的煤氣，充滿了作場，

使人窒息，泥沙粘滿了全身，我們沒有一個時候能像一個人，熱天，更不堪言狀的。我們每個人都皮黃骨瘦。

七個人當中，有兩個是新近進來的學徒，他們的情形自然比我們更糟糕，每天天剛微亮，就被老闆大聲叫起來，生爐子，燒水，敲碎大塊的鋼精和做各種事務，然後我們也被叫起來，天一亮我們就開始工作一直幹到晚上，每天一樣，我們要做上十二三小時的工作，學徒則要做十六七小時以上。我們是人，就是機器，長期如此也是吃不消的。

老闆的獲厚利，就是靠我們這樣死做得來，照理，我們應該可以多得點血汗工錢，但事實上却不然，我們比同行中任何工友都不如，我們每月工資有兩個只得到五萬元，而最多的也不過九萬元，拿這個數目來和老闆的收入相比，實在相差太遠了，而且，以目前的物價來說，這幾萬元能够買些什麼？不要說養妻育子了。至於學徒則連應得的月規也沒有。

在老闆方面，則儘可大吃大用的，橫直他不要花半點氣力，可以坐享其成，他甯可看着我們辛苦終日不得一飽，而不願把一家的無謂浪費分一點給我們。每當老闆又麻將輸了錢的時候，或者，有點不如意的事的時候，我們更成了他的出氣筒。我們以大部份精力共同做出來的東西，給一個不做事不費力的人獨自去享受是合理的嗎？我們得不到公平的待遇還要受許多壓迫是應該的嗎？

不久以前，我們實在再活不下去，我們就向老闆提出我們的起碼要求：應與同行工人同等待遇，

即從五萬元至九萬元工資一月，增加到九萬至十二萬元，這一起碼合理的要求，竟給老闆拒絕了。於是我們當老闆來不及交貨的時候，實行怠工。老闆怎樣的對付我們呢？說來很痛心，他索性趕走了我們，他認爲這是沒有良心，這是搗鬼，他不承認我們是徒弟了。他甯願以十八萬元一月工資的數目向別處把工人挖出來代替我們，而不願增加我們三五萬元一月，這才是真正沒良心，真正的搗鬼。

這種情形正如大廠家的資本家，甯願花很多的錢給巡捕或警察去鎮壓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不願將這筆錢去增加替他賺錢的工人工資一樣，都是資方破壞我們鬥爭的辦法。

我們在老闆的這種刻毒的辦法之前失敗了，不到幾天我們原來的工作場所給另一批人繼續作着。我們從此更陷於貧困的境地。有好幾次我們碰見我們的老闆，他以得意的眼光蔑視我們，而我們則回復以不屑的仇視的眼光。

經過這次小小鬥爭以後，我們覺得我們的利益與老闆的利益是勢不兩立的，我們並不因爲失敗而垂頭，我們的失敗是因爲我們人數太少，孤立而無助，我們相信如果當時我們能够和各翻沙作的工友取得連絡，我們決不會失敗的。因此我們今後應該知道：要生存只有鬥爭，要鬥爭必須聯合起來，人多了而且一致了就會發生力量，有力量就可以獲得勝利。

本刊從第十三期起暫改爲每月出版一期，篇幅如舊，內容將更側重理論。『中國革命悲劇』亦將恢復連載。每期售價則從三元改爲五百元。

編輯部